



丰湖书院始建于南宋,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近千年来多次重建。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丰湖书院废弃300多年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提督王文雄、惠州知府李士瑜、连平州知州徐旭旦于西湖黄塘寺之左、览胜亭之右,捐俸共建丰湖书院。

城之内,西湖之畔,丰湖书院肃立,从康熙中期择址迁建,到雍正年间因文字狱牵连一度被废止,又到嘉庆初重返原址二度复建,到光绪末改办惠州府学堂并成为粤东辛亥革命重要据点,再到成为广东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千百年来,经历了多次重建的它,模样早已不同往昔,历史地位却从未发生改变。

历史上,它为惠州培养了大批人才,培育了其文化基因,造就了惠州岭南文化交流中心的历史地位。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康熙为丰湖书院题了墨宝,足见丰湖书院的地位,但它又何以得此机会?

丰湖书院 缘何得康熙墨宝

惠州考古发现《丰湖书院书籍碑记》,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物收藏及研究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丰湖书院的历史人文内涵。

丰湖书院始建于南宋,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近千年来多次重建。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丰湖书院废弃300多年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提督王文雄、惠州知府李士瑜、连平州知州徐旭旦于西湖黄塘寺之左、览胜亭之右,捐俸共建丰湖书院。

书院所建不久,提督王文雄(号毅庵,浙江人,文章人品、政事清操,历官皆然,提督尤著。)在书院西侧修建“御书楼”,并把康熙皇帝御赐诗章摹刻于石,供奉楼上。

为何称“御书楼”?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惠州市文化局主编的《惠州史稿》(1982年版本)第五章西湖古迹考记载,御书楼在丰湖书院,清提督王文雄请康熙皇帝写了杜诗四句,刻在石头上,藏之以楼,故名。为何惠州还能获康熙御书?

根据康熙年间专门呈给皇帝御览的《惠州西湖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有编制《皇舆全览图》(即当今的全国地图)的计划,为此康熙特差钦天监、理藩院、养心殿的官员苗寿、额尔代及武英殿监造布尔赛,这些负责观察气象、颁布历法及文书官员会同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二位共同来惠州绘图,实地丈量西湖。

钦差大臣来惠数日,极为郑重。时任广东提督的王文雄按理也会陪同到惠州。上述《惠州西湖志》卷之一丰湖书院条目亦有记载:“……公(王文雄)以是娇众议,更捐俸恭建御书楼,敬摹御赐诗章匾额以上,俾边海编氓咸得仰瞻宸翰……”

御书楼建成后,为使临海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丰湖书院瞻仰帝王的墨迹,特意摹刻康熙皇帝的书法,供奉在御书楼上。另这本《惠州西湖志》卷之八事实还记载一则事例,时康熙五十五年,任职广东提督的王文雄在惠州丰湖书院后盖一楼,楼上供奉着皇帝的御书,在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即百官朝参加朔望的日子,都会穿上朝服登楼,朝北叩首,以报君泽,以请圣安。

当时在文教建设中能实实在在得到皇帝的恩宠并御赐墨宝,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一件盛大喜事,因此书院落成之时,军民杂沓,肩摩背负,塞满湖堤,歌颂之声响遏行云。

根据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世经堂藏版《惠州西湖志》(卷二)的十七胜迹图之丰湖书院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当年“御书楼”大概样式,该楼平面呈六角形,为三开间、悬山顶、中间有一正脊的二层楼阁式古典建筑,位于丰湖书院正后方,周边有文昌阁、黄塘寺等。

御书楼建成后,为使临海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丰湖书院瞻仰帝王的墨迹,特意摹刻康熙皇帝的书法,供奉在御书楼上。另这本《惠州西湖志》卷之八事实还记载一则事例,时康熙五十五年,任职广东提督的王文雄在惠州丰湖书院后盖一楼,楼上供奉着皇帝的御书,在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即百官朝参加朔望的日子,都会穿上朝服登楼,朝北叩首,以报君泽,以请圣安。

2010年,惠州重建惠州丰湖书院时,出土一通石碑,残高104厘米,宽53厘米,厚约7厘米,墨石质地,字体为楷书,繁体阴刻,从右至左竖排,显得端庄厚重,但因表面磨损严重,碑上文字难以辨认,后陈列在丰湖书院藏书库。

近期,经仔细辨认表面残存的文字,发现这通石碑实为《丰湖书院书籍碑记》,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题记立碑,距今约190年历史。从这通碑记内容可知,作者顾椿,为广西桂林桂县人,累官桂林知府。清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二年(1832)应惠州知府杨希銓之邀,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据清代光绪《惠州府志》卷二十四艺文记载,该碑记全文原有500多字,目前这通出土石碑残存可辨认文字约50字。

通过史料记载的碑记内容可获悉,时任惠州太守杨希銓见诸生家少藏书,丰湖书院又尚无书籍,自思捐出自己的年薪和养廉金,购买了《御笔七经》《史学精华》《渊鉴类函》《康熙字典》《钦定四书文》及《四书汇参》等经史诸书合计589本,是为书院“藏书之先声”。这些书籍后来都悉数藏入丰湖书院观楼内,足足放满两个橱柜,以便给更多的学子翻阅查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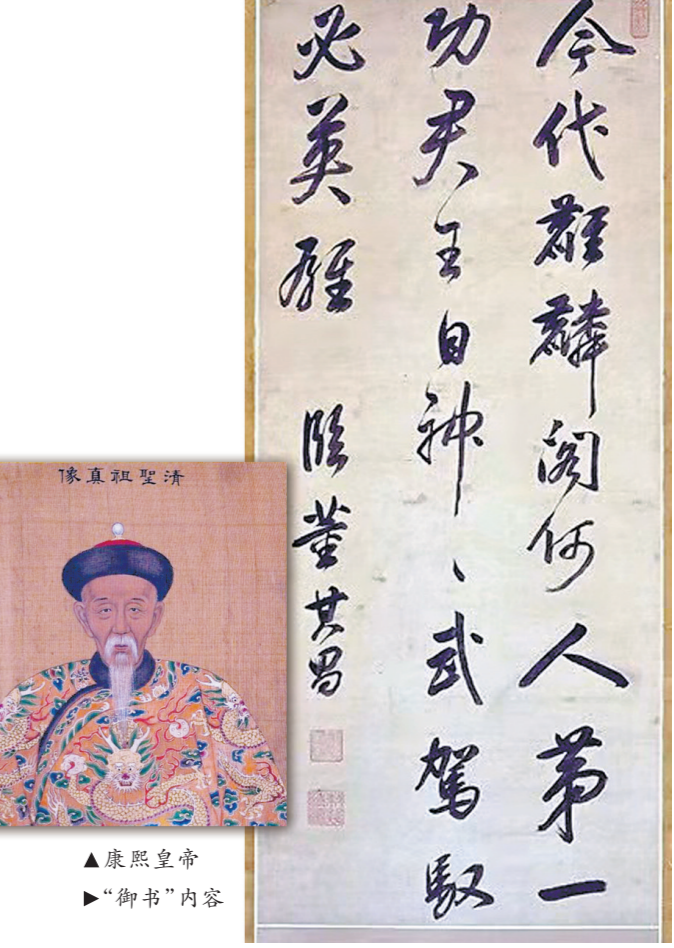
正因为这些藏书,50多年后,梁鼎芬踏足并主讲惠州丰湖书院,为其创设当代图书馆管理模式——“丰湖书藏”打下了基础。而丰湖书藏可谓耗尽了梁鼎芬的心血,以致其离开惠州后,还放话道:数百年后,征求文献,必有到我丰湖者也。可见当时丰湖书院藏书数量非同一般。

“夜阅读课卷一百本”体现了当时梁鼎芬初至惠州丰湖书院即全力以赴,一心投入教育,为培养好惠州士子的莫大决心。

千里慕名入惠州。这是梁鼎芬在其一通手札中表达的意思,该手札题为“奉托二事”,手札中有一段话:处州有黄山山谷范滂传石刻,务欲借观,重摹上石,惠州有范祠也……梁在惠州丰湖书院期间,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十三日写下了《祭范孟博先生文》。

据民国《惠州西湖志》记载:“范孟博祠在丰湖书院东,记东汉党人范滂,知府夏献铭奉命筑。”范滂(字孟博)为人正直清高、有气节,后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四行而一直受世人钦佩,同时,他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榜样,为苏轼自幼所崇拜。另一则史料也表明:“光绪丙戌春,梁节庵(梁鼎芬)先生主讲丰湖,因集郡人士,建后汉范孟博先生祠于书院东。”范滂高尚坚贞的风骨气节和整肃政治、清除奸佞的品质,正是当时封建士大夫要学习的标准,也成为惠州知府夏献铭和梁鼎芬决心在丰湖书院兴建范孟博祠的主要原因。

“夜阅读课卷一百本”体现了当时梁鼎芬初至惠州丰湖书院即全力以赴,一心投入教育,为培养好惠州士子的莫大决心。



丰湖书院当代印记

提起惠州古代文化教育界的功臣,大家就会下意识想到苏东坡。然而,在不少惠州市民的心中,清代惠州知府伊秉绶复建丰湖书院,订立学规,重教育兴文化,同样长久影响着惠州文教的发展。

“敦重”学风传承至今。惠州西湖内,有一处小岛,名为“丰湖半岛”,岛上湖光潋滟,古树苍苍,沿着小石路漫步,可到达丰湖书院,书院760多年建立,清代迁建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惠州师专—惠州大学—惠州学院所在地。

2009年惠州学院从丰湖书院迁出后,原地按照宋代风格重建,成为一个集文化、休闲、旅游、园林为一体的西湖核心人文生态景观,包括文学院、书画院、藏书楼、文昌阁和湖水轩等建筑,书院建筑古朴典雅,园内小景、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环境清幽,偶有鸟语蝉鸣,游客在其中也悠然自得。



“丰湖书藏”踪迹可循

“丰湖书藏”盛名为何流传至今呢?丰湖书藏是梁鼎芬任职丰湖书院山长时所创。关于丰湖书藏的建立,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高足李琦曾撰文追述:“……书院之西,建楼三楹,四部略备,名曰书藏。既定借书之约,复设扫尘之例。亲手题签,自装部目……盖书藏之有书藏,由惠州始也。”它标志着惠州乃至岭南地区从管理森严的藏书阁向现代化、民间化的图书馆迈进。

丰湖书藏具备了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尤其是丰湖书藏中的“四约”(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四部分,共计五十六条细则),在清代藏书规范中,以其条目为最多,内容亦最为详备,很多已具备了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

目前,惠州惠云图书馆正在进行古籍的详细梳理,但由于馆内从事古籍工作人员手紧缺,任务艰巨过程漫长,现暂时只发现《陶渊明文集卷第四》和《桐阴论画二编目录上卷》两册书上印有“丰湖书藏”的馆藏印。

丰湖书院



清吴嵩御书楼诗
御书楼(有序) 吴嵩
杭州西湖履荷宸游驻,天章鸾凤,雨露所沾,泉石增色。飞楼画栋,丽甲寰中。惠州僻处遐荒,未免叹日边春色之远。自提督王文雄邀赐御书杜诗:“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提督文雄摹与石,供奉丰湖书院之上。遂使西湖勺水,光溢恩波。谨以樗材,愚切守,躬逢六十一年最运,河清海晏,岭表雍和,无殊几旬。瞻兹宸翰,如观天颜。愧仆庸碌,恭纪一章,以志盛事。盖不仅为西湖庆也。